

汉语言文字学书系  
HANYUYANWENZIXUESHUXI

清代  
前期

古

音

学

研

究

QINGDAIQIANQI  
GUYINXUE YANJIU

张民权 ● 著

翔实的文献资料 清初古音学的历史概况  
传统古音学的一些重要结论的修正  
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的披露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张民权 ● 著

清代前期

古音学研究

上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张民权** 1957年生，江西南昌人。从小在家务农，做过小学和中学教师。大学毕业后继续教书。自1991年起就读于南昌大学和南京大学，分别获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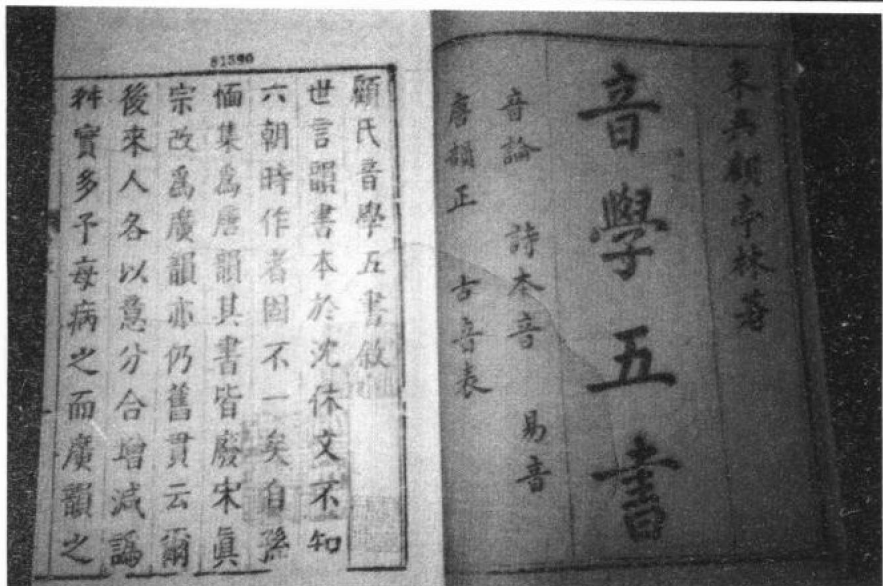
本人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史的研究，发表了这方面的系列论文二十余篇。论著《吴棫〈诗补音〉与宋代古音学研究》（即将出版）是本人多年的攻坚之作，这项研究将使失传千年的汉语史巨著《诗补音》再现于今日。

汉语言文字学书系  
HANYUYANWENZIXUESHU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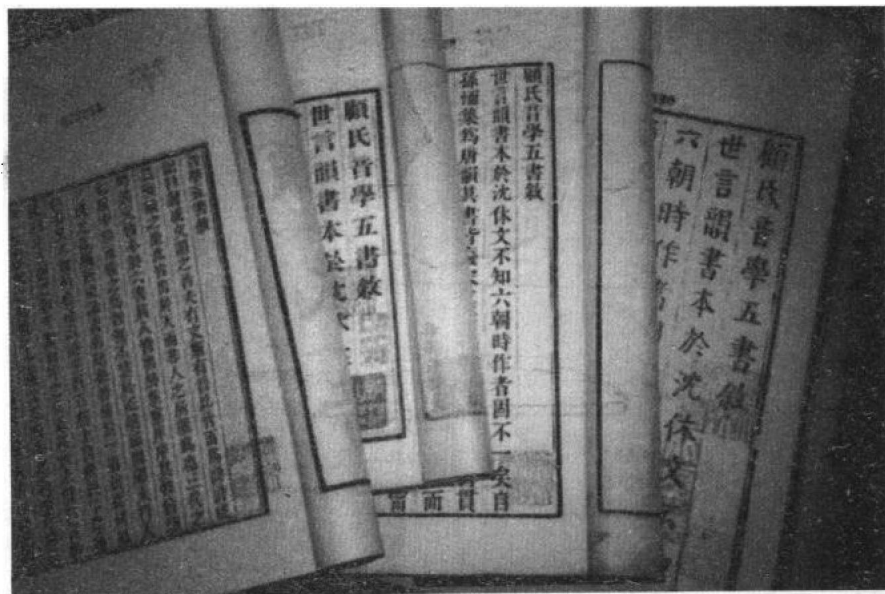


QINGDAIQIANQI  
**GUYINXUE**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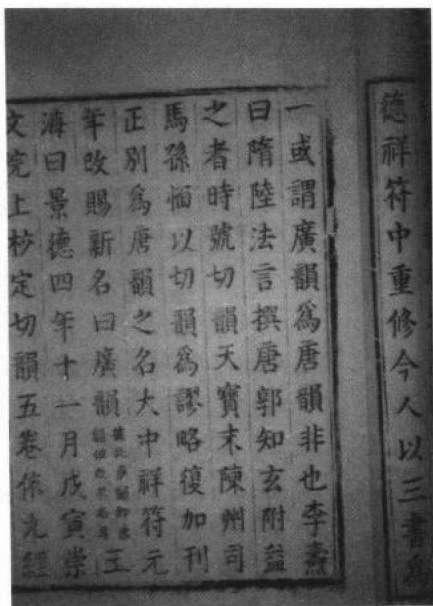




▲ 顧炎武《音学五书》早年刻本，康熙六年（1667）张昭校刻符山堂本，左边为曹学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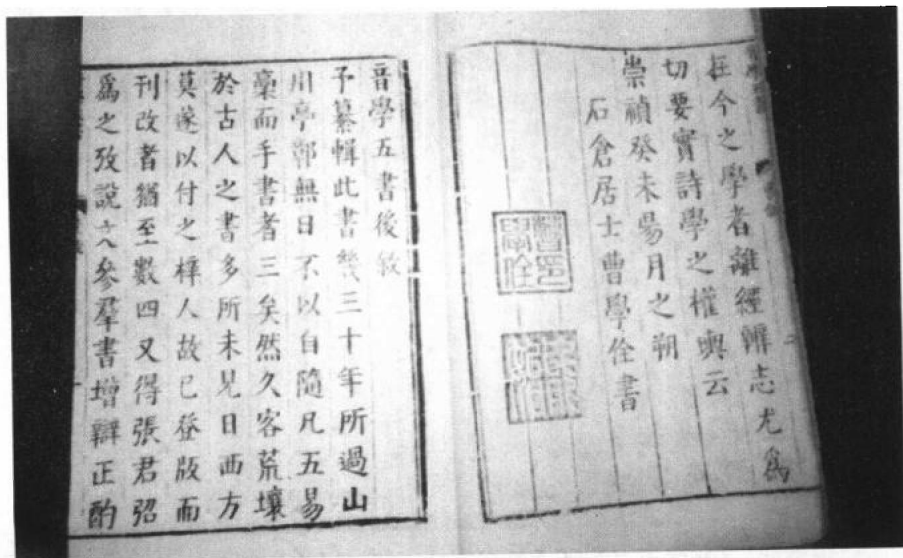
▲ 顧炎武《音学五书》版本数种：1、张昭刻符山堂本；2、光绪十六年（1890）长沙思贤讲舍刻本；3、光绪十一年（1885）四明观稼楼仿刻本；4、民国二十四年渭南严式诲《音韵学丛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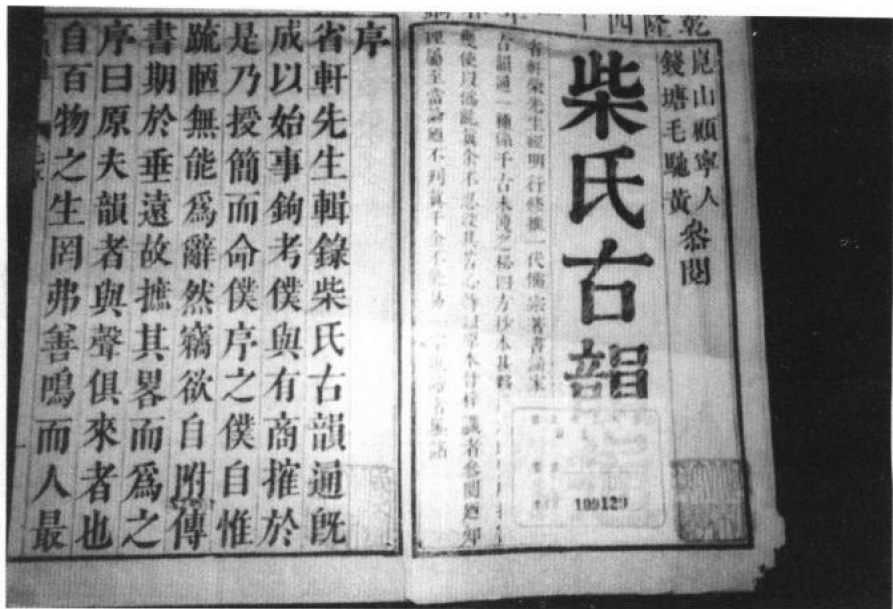
▲ 符山堂本《音学五书》之一《音论》书影，其中“校”字缺笔，避明熹宗朱由校讳。



▲ 符山堂本《音学五书》前徐氏三兄弟（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为顾炎武书堂所作的《征书启》。



▲ 符山堂本《音学五书》所附曹学佺序崇禎十六年（1643）和康熙十九年（1680）作者后序。从二序所作时间先后可推考此书著述的起止时间。



▲ 柴紹炳《柴氏古韻通》乾隆年間刻本，上有顧炎武毛先舒參閱字樣，左邊為毛先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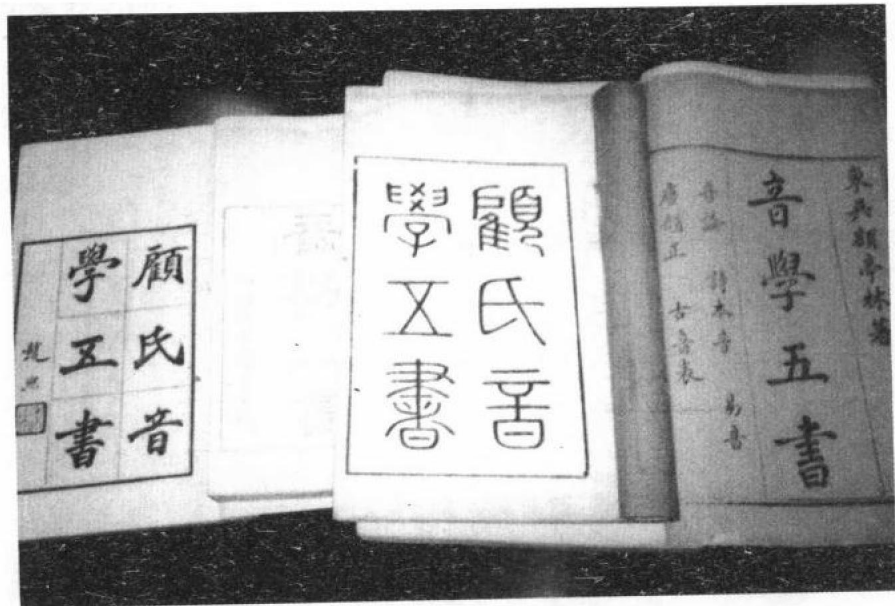


▲ 毛奇齡《古今通韻》康熙甲子年(1684)史館刊本。





▲ 左起：邵长衡《古今韵略》，康熙三十五年（1696）宋萃序刻本；李因笃《古今韵考》，渭南严氏音韵学丛书本；毛奇龄《古今通韵》，康熙甲子年史馆刊本。



▲ 顾炎武《音学五书》数种扉页款式。

## 序

为人作序,也是一种严肃的有意义的学术写作。只要是处以公心,的确是有感而发,且有利于学术发展,就应该勉力而为。褒其所当褒,是其所当是,其它在所不计也。段玉裁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称赞其“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王念孙序“吾友段若膺”《说文解字注》,称赞其“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二序都是敢褒敢是的典型,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王力先生说:“《说文段注》有王念孙的序,很重要。王序把段注整部书的优点都讲了。”而且说,读书“首先应读书的序例。”现在有一种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为人作序的风气,这对学术发展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乐意为张民权的《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作序,不只是出于个人友情,也不只是出于阅读全稿后的激情,而是出于学术上的责任感和伦理上的道义感。一个人辛辛苦苦在学术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就应该有人站出来讲公道话,张扬学术正气,勇于高唱正气歌,这是学术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人怀嫉妒之心,“老夫”不愿“避路”,害怕年轻人“出一头地”,甚至千方百计挤轧之,诋毁之,这不只是当事人个人的不幸,也是学术的大不幸!我认为:这样的“老夫”真是罪该堕入十八重地狱!而且我还认为,同辈人犯此嫉妒罪过者,起码也应该堕入九重地狱!嫉妒不仅可以毁灭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时代的学术,无数事实都可证此言不

谬!

清代古音学的研究,尤其是清代前期古音学的研究,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该利用的材料都已经利用过了,该作的结论也都早已作出来了,还能作出什么有意义的大块文章来呢?而张民权却能出人意料之外,从文献的海洋中捞出了许多久不见天日的瑰宝,作出了大块文章,以致清代古音学史的许多重要结论得重新斟酌。全书六编四十余章,出现了一大批我们熟悉的、半生不熟的或完全生疏的古音学家和古音学或跟古音学有关的著作。清以前的那几章就不说了,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初期这百余年间,就有顾炎武、柴绍炳、毛先舒、方以智、方中履、萧云从、张自烈、王夫之、毛奇龄、熊士伯、邵长衡、李因笃、李光地、潘咸、阎若璩、潘耒、叶嵩巢、张晴峰、万斯同、方迈、张志远、蒋骥、张叙、刘维谦、龙为霖、王植、仇廷模、万光泰,另有陈启源、严虞惇、范家相、顾镇、谢起龙,还有黄生、王霖苍、徐用锡等,这些人并不是都以古音学名家,有的著作已失传,而张民权大张网罗,即使只有一得之见者,只见于他书而著作已佚者,一一打捞钩沉,不使漏网,其存心可谓良苦,其操作可谓坚苦。古人如地下有知,必然要为张民权击节高歌,敲破唾壶,浮一大白。语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张民权的一片公心,虽然还不至于可惊天地,至少可以泣鬼神了。哪一个学者不愿意自己的著作长存天地之间活在后人的心目中呢?公心私心于此打成一片。

当然,在这一长串的一系列的古音学家中,坐第一把交椅的还是顾炎武。永远的顾炎武,这个结论是无法改变的。但就是顾炎武的古音研究,张民权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细节,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至于对潘咸、对万光泰的“发掘”,更令人耳目一新,且导致传统结论的动摇。请问海内外的音韵学名家,有几人读过潘咸的《音韵源流》?又有几人读过万光泰的《古音表考证》?我个人不仅没有读过,也没见过这两种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小学

类存目》介绍过潘咸的《音韵源流》，亡友李新魁先生惠赠的《韵学古籍述要》（与麦耘先生合著）“题跋提要”类就是据《四库》所言谈了此书的大概（见该书 552 页）。张民权先生研究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手抄本，发现“原书 60 卷，现仅存 59 卷。”“推知此书至迟作于康熙 35 年以后。”从而断言潘咸是“清代真正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凡同声者必同部’的实践者。段玉裁‘凡同声者必同部’的作法，至少在段氏前半个世纪，就有人尝试过。”关于万光泰，《四库全书总目》只在《别集类存目》中介绍过他的《柘坡居士集》，称赞其“才思富赡，篇什颇多”，对于万氏的音韵学著作只字未提，连他中举人的年代也给搞错了。是张民权从天津图书馆发现了万氏的《古韵原本》（乾隆九年）、《古音表考正》、《经韵谐声》、《沈氏四声谱考正》等手抄本，使万氏在古音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将随着民权大著的问世得以为学界所知闻。当然，这些极富创见的著作如能公开出版，则万氏甚幸，学界甚幸，诚功德无量之举也。万氏先分古韵为 13 部，后又分为 19 部。其创建之功，民权总结为如下 5 条：

第一，支、脂、之三部的划分比段玉裁还要完善（万氏分立此三部时，段玉裁还是少年儿童呢）；

第二，鱼部、侯部、幽部、宵部以及真、文、元三分与段玉裁也非常一致；

第三，至部、废部的独立，也远远在王念孙、江有诰之前；

第四，未部独立解决了物部阴入相承的问题；

第五，入声韵与各自的阴声韵相配，与江有诰的入声配置基本一致。

张民权说，如果把万光泰各韵部的入声分离出来，古韵阴阳入三分，其格局就是：

阴：歌支之脂未废鱼侯幽宵○

入：○锡职至物月铎屋觉药缉

阳：○耕蒸真淳元阳东○○侵

在乾隆十三年(1648)万光泰的古韵部格局就已如此精密,段王等人的确是“瞠乎其后”了。可惜万氏得年仅39,“其研究成果却埋没至今!是著述之家有幸又有不幸者也!”张民权在这里连用了两个感叹号,他的喟然长叹已悄然“见于面盎于背”快要穿透纸背了。古来学有成就而其名不彰其学不传的“不幸者”,何可胜计!万氏在二百余年之后得逢张民权先生,岂非“不幸”之中的万幸!

张民权的古音史研究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其主要原因有二:

头一件是当某些人忙着自创体系忙着与国际接轨忙着大玩音标游戏时,他能脚踏实地、勤于考索、向文海进军。为了追踪万光泰,他每天早早地从北京出发坐上火车自带干粮钻进天津图书馆一干就是一整天,晚上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家中整理抄录的材料,第二天又赶早向天津进发。我说:“你为何不在天津住上几天呢?”这位忠厚的农家子弟坦然地说:“住旅馆太贵呀!”是啊,某些握有大把基金的人不去钻图书馆,而他这个要外出钻图书馆的人又囊中羞涩,这叫我说什么好呢?我只能深表同情,由衷钦佩。他的这部《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有许多材料都是由他亲手发掘而来,这些发掘后面究竟包含着多少苦辛、多少路程、多少抄本、多少干粮、多少个不眠之夜,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跟张民权先生并不算太熟,只见过有数的几面,我无法得知他的刻苦用功的故事,不能向读者报导更多的感人的细节。对于中国当前的学术界来说,这类故事,这类细节,恐怕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件是有名师指点,走的是学术研究的正道。如果他要是跟着歪嘴和尚念经(即使是远来的洋歪嘴和尚),根本瞧不起文献资料的考索,他这本书就肯定写不出来了。现在从海外传来一股歪风,认为文献资料的研究是落后了,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人阐释古书的能力很低,甚至连转引二手资料都出错,就指手画脚,欺行霸市,摆出一副“洋教头”的架势,妄图一手打倒王力,双脚踢翻章黄,以酷评险怪之言,内以自欺,外以惑众,真不知道自己能吃几

碗干饭了。早在大约 70 年以前,林语堂先生就批评过“哈佛腐儒”,说“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林先生对此等“俗气十足”的人是“十分讨厌”的。70 年过去了,这种“腐儒”是否绝迹了呢?没有。他们挥舞大棒,要阻挡“多元化”“本土化”文化大潮。腹空心高,妄自尊大,歪曲前贤,蔑弃传统,能不令人“讨厌”!

张民权先生是有幸的,他没有沾染“哈佛腐儒”的坏习气。他先后受业于南京的鲁国尧先生,北京的王宁先生。鲁先生受业于王力、周祖谟先生;王宁受业于陆宗达先生,是章黄学术在海内的正宗传人。章黄与王周的学术背景有所不同,但学术大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音韵学研究,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都知道,门户之见是极为有害的。所谓大节,就是他们的语言文字研究都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泥土之中,都以发掘本民族母语的特点为己任,他们认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是中国语言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中国特色这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规定,客观事实本来就是如此。何况一切学术研究,都应该遵从多元化的特点,妄想定于一尊,这就有悖于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了。

当然,一个人如果“举头望明月”就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低头思故乡”就说“自己的故乡在美国”,我们对这样的人谈母语情结,谈文化要多元化,怎么能得到他的首肯和认同呢!是的,我也懂得学术无国界,可母语有国界,传统有国界,话语权有国界。我也懂得,向西方学习,向一切优秀文化学习,大有好处,极为重要。但西方人说,夏商周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又说《诗经》时代汉语无声调;又说上声来自 - ? 尾,去声来自 - s 尾;又说上古汉语只有两个元音,等等等等。作为一种个人见解,未尝不可;有人愿意搜集证据,随声附和,为之帮腔,这也是个人自由,也应受到尊重。

但主此说者,一定要别人也顺口接屁,作应声虫,否则就是“落后”,就是不入“主流”,就要遭受横扫,这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往今来一切有品位有教养的学问家,似乎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都懂得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要出示铁证,要靠事实说话,不是胡乱地抓几个例子就可了事的。在事实面前,我们永远要谦卑,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一切无根游谈,可以自我欣赏,可以在小圈子内互相恭维乃至吹嘘,反正有钱有时间吗,但它的必然命运就是灭亡。其实,他们这一套在西方学术圈内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只能向大陆内地倾销了。反倾销,看来要提上日程了。现在人人都学会了“国际化”、“与国际接轨”的高调,这是好事。但物质文化的“接轨”与“国际化”和精神文明、人文社会科学的“接轨”、“国际化”性质完全不同,只要汉语还是我们的母语,汉语研究就不要乱谈什么“国际化”。现在有人理解的“国际化”是以牺牲本民族文化为代价而大搞“外国化”,或者更彻底地说是“美国化”。他们中的某些个人要使中国语言学家彻底丧失自己的话语权,抛弃自己的传统,否定自己的权威,然后乘虚而入,以学术大佬自居,让追星一族(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一族”)哈着、捧着,汇成浩浩荡荡的“主流”,岂不猗与休哉!

当前上古音的研究,正面临着关键时刻。如何把文献资料、方言资料、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有机地谨慎地结合起来,这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只要是研究上古音(指周秦时代),就应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基础不牢,音标就有可能成为可玩弄的游戏符号。我多次想过,李方桂、王力、董同龢诸前贤,他们之所以很少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来谈上古音,是他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吗,是他们不会玩弄这一套吗,当然不是。他们不愿意驰心于空谈之域,是怕带坏风气,败坏学术,盖其慎也。也不是说,他们不利用或很少利用,后人就不可以利用这类资料,只要条件成熟,当然可以大胆利用。我个人并不反对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来证上古

音,但前提是必须与文献资料相契合。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假设,逻辑推导,但前提必须是与汉语的历史和汉语的系统相符合。我们并不要求在探索中写出来的著作就一定要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一定不能出差错。但也不赞同以探索性的东西为标的来划分什么先进与落后,主流与支流。大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平等讨论,求同存异,有什么不好呢!

张民权这部著作完全用事实说话,完全取材于文献资料,他所研究的内容决定了这样的特色。中青年学者愿意这样下苦功夫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特别看重这种精神,愿意向社会推荐其人其书。

“一切好书都有缺点。”(王力语)这是至理名言。《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并不就是十全十美没有缺点了。我曾经就书中的一些问题与民权先生当面进行过切磋,我当然不敢说我的意见就一定正确,供参考而已。他在最后定稿中又作了哪些修改,因时间关系也就无暇再谈及了。我相信以民权的严谨与执着,文章是会越改越好的。

本序文似乎说了一些与张著无关的话,从宏观上看还是有关的。人生苦短,学术研究如不选择正路,岂不是浪费生命。我们肯定张民权的研究道路,大而言之,也是为了中国语言学事业能健康地向前发展,我想张民权先生是能理解这一点的。

何九盈  
2002年



## 序 例

### 一、研究清代前期古音学的历史意义

清代前期古音学,是指明末至清乾隆初年也就是江永《古韵标准》问世前学者们对古音韵的研究。这期间经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并下至乾隆二十年为止的一百多年时间。1644年明亡清立,此年为明崇祯十七年和清顺治元年。而江永《古韵标准》的问世,大致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sup>①</sup>前。因此,我们把这段历史时期的古音学称为清代前期古音学。

我们认为,清代古音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明亡清立到江永《古韵标准》问世为止,这是清代古音学的开创和探索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江永到张成孙《谐声韵谱》问世为止(1814),也就是乾嘉时代,是清代古音学的发展和成熟时期;最后一个阶段是从道光时代到清末为止,这是清代古音学最后的发展和总结时期,其殿军是章炳麟。道光十三年(1833),夏忻著

---

<sup>①</sup> 《古韵标准》的著述,不知始于何年。江永作于乾隆二十四年的《音学辨微序》曰:“余有《四声切韵表》四卷,以区别二百六部之韵;有《古韵标准》四卷,以考《三百篇》之古音;兹有《音学辨微》一卷,略举辨音之方。”知此年三书均已完成。曹述敬先生主编的《音韵学辞典》,亦认为《古韵标准》“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第68页)